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先进性 是其世界引领性的内核

陈 鹏

(上海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83)

摘要: 全球生态危机呼唤新的文明形态与哲学变革。通过比较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三种主要生态哲学范式, 揭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哲学层面实现的系统性革命性超越。该思想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本体论创新消解了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预设, 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论突破打通了发展与保护的二元困局, 以“系统治理”的方法论变革为复杂生态难题提供了整体性辩证智慧。这种系统而深刻的哲学先进性, 构成了其世界引领性最深层的内核支撑: 先进的本体论孕育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引领, 先进的价值论开辟出绿色现代化的路径引领, 先进的方法论贡献出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制度引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 更是一种超越地域与文明界限、具有普遍理论意义的生态哲学新范式, 为人类文明从工业形态向生态形态的转型提供了哲学导向。

关键词: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生命共同体; 哲学先进性

中图分类号: D26; X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6)04-0389-07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60812468](https://doi.org/10.13256/j.cnki.jusst.sse.260812468)

The Philosophical Advancemen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itutes the Core of Its Global Leading Power

Chen Peng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Global ecological crises call for a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and philosophical transformation. Comparing three major paradigms of Western ecological philosophy —anthropocentrism, ecocentrism, and eco-Marxism, this paper reveals the systematic and revolutionary transcende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rom th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Its ontological innovation that “humanity and nature are a community of life” dispels the metaphysical presupposition of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its axiological breakthrough in the proposition that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resolves the binary dilemma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and its methodological shift toward systematic governance provides holistic dialectical wisdom for tackling intricate ecological challenges. Such systematic and profound philosophical advancement constitutes the innermost core underpinning its global leading power. Its advanced ontology generates conceptual guidance on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收稿日期: 2026-08-12

第一作者: 陈 鹏, 男, 教授。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E-mail: chenmingjun157@163.com

all life on Earth”; its advanced axiology pioneers a path toward green modernization; and its advanced methodology provides institutional guidance for fair and just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ore than merely the fundamental guideline for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presents a new paradigm of ecological philosophy with universal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hat transcends regional and civilizational boundaries, offering philosophical orientation for transforming human civilization from an industrial form to an ecological form.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munity of life; philosophical advancement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生态危机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共同挑战之一。气候变化加剧、生物多样性锐减、资源日益枯竭,这些全球性生态问题不仅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根基,更深刻暴露出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实践模式的深层困境。单纯的技术改良、政策修补已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生态持续恶化的趋势,人类文明走到了一个必须进行根本性反思和范式转型的历史关口。全球生态危机正在急切地呼唤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而这种文明形态的诞生,又必须以一场深刻的哲学变革为先导。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其系统的理论体系、鲜明的实践指向和宏大的全球视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同。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被国际社会广泛引用,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产生深远影响,再到中国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议程,这一思想正展现出强大的世界感召力与引领性。本文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先进性,是其世界引领性最深层、最稳固的内核支撑。唯有将这一思想置于中外生态文明哲学范式的广阔谱系中,系统检视其在回答人与自然关系这一根本问题时究竟比既有范式实现了怎样的超越,其理论价值才能真正显现。

一、主要生态文明哲学范式及其比较

所谓“范式”,借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的概念,是指一个学术共同体所共享的基本信念、价值取向与解题模型^{[1]45-52}。在生态文明的思想谱系中,围绕“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根本问题,形成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哲学范式。

(一) 西方人类中心主义范式及其困境

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是工业文明时代最具主导性的生态哲学范式,其思想根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中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以及基督教传统中人类对万物的“管理权”观念。进入近代以后,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主客二分哲学进一步将自然彻底对象化,培根(Francis Bacon)的“知识就是力量”则赋予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工具理性信念。在这种世界观框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根本性地理解为一种“主体—客体”关系,人是唯一具有意识、价值和目的的存在者,而自然则被降格为有待人类认识和改造的物质材料。

人类中心主义范式坚持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在价值论层面,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自然仅具有工具价值,即自然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对人类需求的满足程度。第二,在路径选择层面,人类中心主义对科技理性抱有高度乐观的信念,相信人类可以通过技术进步不断突破资源瓶颈、治理环境污染、寻找替代能源。然而,无论强弱版本如何调整,人类中心主义范式都面临着一个根本性困境:它无法根除发展与保护二元对立的逻辑根源。由于这一范式在本体论上预设了人与自然的分离与主从关系,因此其对自然的“保护”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算计的策略性行为。从根本上说,人类中心主义是工业文明逻辑的哲学表达,它可以在边际上推动环境改良,却无法为一种全新文明形态的建构提供思想根基。

(二) 西方生态中心主义范式及其局限

作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直接反拨,生态中心主义构成了西方环境哲学谱系的另一极。这一范式兴起于20世纪中后期,与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所唤起的现代环保运动密切相关。生态中心主义的核心主张可以概括为两条：在价值论层面，它旗帜鲜明地反对把自然仅仅视为工具，主张自然本身拥有独立于人类评价和使用的内在价值；在实践路径上，它强调人类对自然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主张通过限制人类自身的经济活动和物质欲望，换取生态系统的完整与稳定。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其《沙乡年鉴》中提出了大地伦理学，挪威哲学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创立的深生态学则进一步将批判指向了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文化深层结构。

生态中心主义在纠正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唤起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方面功不可没。然而，这一范式同样面临着深刻的理论困境和实践局限。首先，在价值论上，生态中心主义在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往往滑向了另一极，将人与自然在价值序列上重新对立起来。其次，更为关键的局限在于，生态中心主义难以回应全球发展与公平正义的诉求。当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有能力将大片国土划定为荒野保护区时，广大发展中国家仍面临着消除贫困、实现工业化的迫切任务。生态中心主义在理论上缺乏处理“保护与发展”张力的有效工具，在实践中则容易被批评为“富人的环保主义”。

(三) 生态马克思主义范式及其启示

在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两极对峙之外，生态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分析路径。这一范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分析的矛头指向了造成生态危机的社会制度根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内在逻辑。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判断是：生态危机并非源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也非源于某种抽象的“人性的贪婪”，而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结构性运行的必然产物。加拿大左翼学者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对“控制自然”这一现代性的核心理念进行了知识谱系学的梳理与批判。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中系统梳理了马克思著作中的生态思想，有力回击了“马克思是生产力至上论者”的误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贡献在于，它将制度批判维度引入生态哲学讨论，打破了以往

环境伦理讨论局限于个人道德层面或抽象价值论层面的格局。然而，这一范式也有其未尽之题——批判火力集中于“破”，而对于如何系统性地构建一种全新的人与自然关系、建设一种成形的生态文明，着墨相对有限。

(四) 比较视域下的“范式”坐标：对三大维度的检视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三种主要范式在面对“人与自然关系”这一根本问题时给出了迥然不同的回答。本文从以下三个核心维度对诸种范式进行系统检视。在本体论维度，人类中心主义秉持鲜明的主客二分立场；生态中心主义在价值取向上与人类中心主义截然相反，但在本体论上并未真正摆脱二元论的框架；生态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概念出发，强调人通过劳动与自然发生互动，二者处于一种动态的、历史性的交换关系之中。在价值论维度，人类中心主义只承认自然的工具价值；生态中心主义坚持自然具有独立于人的内在价值；生态马克思主义则更倾向于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价值问题。在方法论维度，人类中心主义依靠技术和市场机制，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改良主义路线；生态中心主义诉诸道德革命和生活方式变革；生态马克思主义则将制度变革视为根本。三种范式在各自关注的维度上都有其洞见，但其共同的盲点在于：它们未能真正超越“发展—保护”“人类—自然”这些二元对立范畴，未能提供一种将二者在更高层面上辩证统一起来的哲学方案。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先进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构建起一套区别于西方近现代生态哲学、具备完整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逻辑的自主生态哲学体系^[2]。纵观近现代西方各类生态理论，无论改良派还是批判流派，都没能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桎梏，只能在原有框架内进行微调，无法从根基重塑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的内在关系。长期以来，西方生态思

想深陷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桎梏,在人与自然关系、发展与保护价值、生态治理路径三大核心议题上形成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困局。立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根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吸收两大思想资源的合理内核,紧扣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现实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求,依次在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层面完成三重系统性哲学超越。

(一) 本体论超越:从“主客二分”到“生命共同体”

本体论是生态哲学的逻辑起点,核心回答“人与自然究竟是何种存在关系”,这一根本问题决定了整套生态理论的分析框架与价值取向。自笛卡尔确立近代哲学“主体—客体”二元划分范式以来,西方主流思想始终将人与自然割裂为两个独立、外在、对抗的实体,由此分化出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两大对峙理论阵营。二者看似立场相反,本质共享“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前提,陷入“非此即彼”的伪争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原创论断,完成了对西方主客二分本体论范式的根本性超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3]50-53}这一论断坚守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核心立场——马克思提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同时创造性融合中华传统“天人合一”整体思维,将传统朴素整体观赋予现代科学内涵,完成古今思想资源的融通转化。“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是生命共同体本体论的具象展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生态系统内在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4]175}山川、河流、农田、森林、湖泊、草地、荒漠等自然要素并非孤立实体,依靠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紧密耦合,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性生命系统^[5]。

从哲学先进性来看,生命共同体本体论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本体论基石。第一,重构生态存在的整体性认知,以辩证整体论替代西方形而上学二元论;第二,打通自然规律与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在关联,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4]29}的文明演化规律;第三,实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时代化原创发展^[6]。相较于西方生态哲学始终困于二元对立的理论僵局,生命共同体理念提供了超越两极对抗的第三条道路^[7]。

(二) 价值论突破:从“二元割裂”到“两山”辩证统一

价值论是生态哲学的核心标尺,聚焦“自然具备何种价值、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如何定位”。依托主客二分本体论,西方生态伦理学长期割裂自然的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片面抬高其中一方而否定另一方的合理意义,形成两种极端价值叙事,进而衍生“要环境还是要发展”的零和博弈困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8],实现生态价值论的革命性突破。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们提问时,首次在国际场合提出: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9]3-7}“两山”论断完整三层逻辑层层递进:

“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承认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确立生态价值底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揭示二者辩证统一、相互转化的内在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清晰点明核心价值逻辑:“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0]231}

从价值内涵来看,“两山”理论实现自然多元价值的一体化整合。绿水青山具备内在生态价值——自然系统维系物质循环、涵养水源、固碳释氧的固有价值;具备经济工具价值——优质生态资源可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绿色低碳产业等经济收益;具备社会人文民生价值——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1]375}。三类价值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共生一体、相互赋能,任何一类价值的缺失都会造成发展模式的片面失衡。

这一价值论突破的哲学先进性集中体现为破解全球发展的零和博弈困局。第一,确立“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辩证价值思维;第

二，拓展马克思主义财富理论，重新定义社会财富范畴；第三，回应全球南北发展失衡的价值矛盾，兼顾发展权利与生态责任。“两山”辩证统一价值论立足人民根本利益，融合短期发展需求与长期文明永续目标，实现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民生价值的有机统一。

（三）方法论变革：从“部分要素”到“系统治理”

方法论是连接生态哲学理论与实践行动的桥梁，脱离科学方法论支撑的生态理念只能停留在理论思辨层面，难以落地转化为长效治理行动。西方生态治理长期存在两种极端路径：局部改良论与激进限制论，二者共享孤立、碎片化、静态化的形而上学思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工具，提出系统治理核心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应该统筹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治山和治林等。”系统治理方法论根植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对立统一、永恒发展的核心原理，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视作相互耦合、动态循环的复合有机整体。

系统治理方法论拥有三层递进的哲学逻辑。第一，自然要素层面统筹一体化保护，从“山水林田湖”拓展至“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第二，空间地域层面统筹全域协同，打破行政区划、上下游、陆海分割的治理壁垒；第三，发展全过程层面统筹源头管控，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系统治理摒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改良思路，也拒绝一刀切限制发展的激进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明确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五大重大关系。

从哲学先进性来看，系统治理方法论是治愈全球生态危机顽疾的总钥匙。其一，以唯物辩证法系统观替代西方形而上学孤立观；其二，兼顾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双重目标；其三，形成“整体规划—分区实施—协同联动—长效修复”的完整治理逻辑链条。西方生态治理

始终困于单一维度的极端路径，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系统治理方法论打通自然、经济、社会多重维度，实现生态治理从被动应急到主动系统谋划、从单一要素管控到全域全过程统筹的范式转型。

三、哲学先进性如何支撑世界引领性

一种哲学思想的先进性如果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的自我确证，便难以产生真正的世界历史意义。各类西方生态理论大多局限于区域发展语境，难以适配全球多元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现实需求，普遍缺少具备普遍解释力的完整理论框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独特力量在于，其哲学内核并非悬置在抽象思辨的云端，而是通过一系列清晰而有力的逻辑转化，从中国的本土实践辐射至全球的公共议题。新的本体论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超越性的理念引领，新的价值论为人类现代化进程贡献了可操作的路径引领，新的方法论则为国际环境秩序的构建贡献了公正的制度引领。

（一）先进本体论支撑理念引领：为“地球命运共同体”奠定哲学基石

全球生态治理之所以长期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国际社会在深层的价值理念层面始终缺乏一种能够超越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文明差异的最大公约数，各国容易从自身短期利益出发形成对立博弈，难以凝聚长期协同行动共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贡献的“地球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能够产生强大的感召力，正是因为其背后站着一个深刻的本体论革命——

“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本体论为“地球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最根本的哲学依据。既然“山水林田湖草沙是命运共同体”，那么同一个地球上的人类社会面对共同的生态系统和共同的生态危机，又何尝不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12]

这一理念引领的现实效应已经清晰可见。2021年10月12日，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地球命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13]。这一理念随之被写入《昆明宣言》，

获得了与会各方的广泛认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多个场合呼吁国际社会“与自然和平相处”，其精神内核与“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契合。与西方环境话语中充斥焦虑悲观、侧重警示灾难的“末日叙事”不同，“地球命运共同体”提供的是积极、包容、建设性的愿景，不制造文明对立，而是倡导各国携手共治。这正是哲学先进性的世界引领力所在——它能够为迷失在分歧与争执中的全球治理进程提供一面具有超越性的哲学旗帜。

（二）先进价值论支撑路径引领：为“绿色现代化”提供文明级方案

在当代全球生态治理的议程中，最棘手的矛盾莫过于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张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基于不同工业化历程，对环保与增长的优先级认知长期存在巨大鸿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论突破，恰恰击中了这一全球性困局的要害。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理念做出过深入阐释：“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4]261-265}这一决策本身就内含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逻辑——将气候行动视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机遇。在能源领域，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截至2023年12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15.16亿千瓦^[15]，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51.9%，在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中的比重接近40%。在交通领域，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958.7万辆和949.5万辆，连续9年位居全球第一^{[16]27}，全球占比超过60%。这些立足本国国情落地的实践充分印证了理论可行性，为全球后发国家走出兼顾增收与护绿的道路提供了现实参照，清晰表明“绿水青山”完全可以转化为“金山银山”，发展与保护的零和博弈是可

以被打破的。

（三）先进方法论支撑制度引领：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公平正义原则

全球环境治理体系面临着深刻的结构性困境，现有部分国际规则带有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路径偏向，难以兼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生存发展的现实诉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方法论变革——“系统治理”——为回应这一难题提供了重要的哲学资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但我们也要充分考虑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和特殊情况，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17]“系统治理”方法论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公平正义原则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呼应，二者均要求以整体性视角统筹历史排放、发展阶段、治理能力多重差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条正式明确了这一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仍以经济和社会发展及消除贫困为首要优先事项。

从制度引领的具体实践来看，中国正在将这一方法论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持续输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合作机制。共建“绿色丝绸之路”便是一个典型的范例。截至2023年8月，中国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18]102-106}，与3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环保合作协议^[19]。在全球气候治理层面，中国始终坚定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的主渠道地位。2023年12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上，通过了最终协议《阿联酋共识》^[20]，首次呼吁各国“以公正、有序、公平的方式减少能源系统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盘点的首次评估进程，同时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在谈判中充分倾听发展中国家合理诉求，平衡各方利益诉求。这些努力表明，中国所倡导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不是一种单一模式的世界扩张，而是真正致力于构建一个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多边机制。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三种主要生态哲学范式的系统比较,揭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哲学层面实现的革命性超越^[21]。这一思想以“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的本体论创新消解了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预设;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论突破打通了发展与保护长期被人为割裂的二元困局;以“系统治理”的方法论变革为复杂生态难题的求解提供了整体性的辩证智慧。正是这种系统而深刻的哲学先进性,构成了其世界引领性最深层的内核支撑。先进的本体论孕育出“地球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引领,先进的价值论开辟出绿色现代化的路径引领,先进的方法论贡献出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制度引领。没有哲学内核的革命性突破,世界引领性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一思想的理论价值早已超越了指导一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范畴。它代表了一种超越地域与文明差异的生态哲学新范式,以其特有的包容性、可行性和正义性,为人类文明从工业形态向生态形态的转型提供了哲学导向^[22]。可以预期,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实践的持续深化,这一思想的哲学内核将释放出更为磅礴的世界引领力量。

参考文献:

- [1] Kuhn 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 [2] 郇庆治. 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 [N]. 人民日报, 2024-07-15(09).
- [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4] 习近平.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 [5] 申怡铭. 习近平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多维内涵、哲学创新及时代价值 [J]. 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4, 8(1): 9-14.
- [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 深刻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贡献——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 [J]. 求是, 2025(16): 32-36.
- [7] 刘毅, 喻思南, 李红梅, 等.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共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 [N]. 人民日报, 2022-06-04 (01).
- [8] 黄承梁. “两山”理念科学真理的味道特别甜 [N]. 中国环境报, 2025-08-15(01).
- [9] 习近平.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 [10]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6.
- [1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23.
- [12] 孙金龙, 黄润秋.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J]. 求是, 2021(21): 65-70.
- [13] 习近平. 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 [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21(30): 9-10.
- [14] 习近平.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 [15]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 2023 年度 [R]. 北京: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2024.
- [16]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4.
- [17] 薄燕.《巴黎协定》坚持的“共区原则”与国际气候治理机制的变迁 [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16, 12(3): 243-250.
-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倡议与行动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外文出版社, 2023.
- [19] 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报告(2023)[R].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23.
- [20] UNFCCC. The UAE consensus: outcome of COP-28 [R]. Bonn: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Secretariat, 2023.
- [21] 沈广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论析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2): 106-114.
- [22] 王鹏伟, 贺兰英.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现代西方环境理论的超越 [J]. 理论导报, 2021(10): 9-11.

(责编: 程爱婕)